屈原精神的核心内涵

□ 王　杰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在中国历史上，一个人与一个节日、一个民俗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恐怕只有屈原了。屈原精神是在战乱纷争、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产生的，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美政思想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国将要结束七国的战乱，走向国家的统一，这是必然趋势。但谁最有资格掌握这个领导权？在当时，七国当中，比较强势的是秦国和楚国，屈原作为楚国的左徒大臣，他有一套治国理政的方略，也就是他的美政思想。屈原的美政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仁政治国。屈原在总结历史兴衰存亡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善”与“义”的治国理念。《离骚》中说：“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意思是说，回想过去，展望未来，成败得失，体察民生之计，应该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治国之道，哪有不仁不义的国君，能长久地享有天下呢？这里的义、善均为美政的内涵。

重视民本。《尚书》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思想是三代以来，先贤治国理政的共识。屈原也接受了这一先进思想，并将其作为自己美政思想的重要内容。如《离骚》中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这些都体现了“民”在他心中的地位。《离骚》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共377句，2476个字。《离骚》大致可以分为上下两大部分，上半部分屈原自述自己的身世、遭遇，反复倾诉自己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表达了要求革新政治的愿望和坚持理想、虽遭逢灾厄也绝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意志；下半部分通过神游天界、追求实现理想和失败后欲以身殉国的陈述，反映出诗人热爱国家和人民的真挚的思想感情。

“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治上选拔贤能者担任官吏，遵循法令的准则不能有偏差。“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说的是，把先代的业绩昭示众人，使法令准则严密无疑可存。国家富强而纲纪严密，政在贤者而天下太平。概括地说，就是在内政上主张举贤任能，彰明法度。

节操情怀

屈原的美政思想是屈原精神的一部分。美政思想是屈原在朝堂时的治国理念，而屈原精神则是他一生思想的升华与凝结。更重要的是，屈原在流放时期，经过艰苦的磨难之后，对天下世事及自我认知有了更加深刻的洞察与反思，这也使他的精神世界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博闻强记，明于治吏，娴于辞令”“入则与君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为楚国左徒重臣。他力图变法图强，推行其美政，使楚国得以强大。当时秦想吞灭各诸侯，兼并天下。屈原为了楚国，东使于齐，目的在于与齐国结盟。秦国担心楚、齐结盟，对自己不利，于是就派遣张仪出使楚国，贿赂楚国上层那些奸吏，污蔑陷害屈原。为了国家的命运，屈原至死不渝，坚定专一，绝不低头屈服。

屈原早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橘颂》，这是一首咏物抒情诗。屈原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橘树的形象就是屈原用以激励自己坚守节操的榜样。其中的名句，如：“后皇嘉树，橘徠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桔树的形象正是屈原的自我写照和自我激励，这是屈原精神的生发。屈原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屈原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尖锐地抨击了昏庸王室的黑暗和腐败，表达了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贞，表达了自己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忧愁苦闷，更表达了“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的清白节操。这种精神与《离骚》中“虽体解吾犹未变”的精神是一致的。

《渔父》体现的就是屈原高尚的节操情怀。渔父是一位避世隐身、钓鱼江滨的隐士，他劝屈原与世俗同流，不必独醒高举，而诗人则强调“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也要保持自己清白的节操，全文采用对比的手法，通过问答体，表现了屈原与渔父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其中“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爱国精神

屈原精神的核心与根本就是“爱国精神”。屈原《九歌》中的一首《国殇》，是颂悼当时为国捐躯战士高尚志节、歌颂他们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的挽歌。屈原精神的实质是心忧家国、矢志不渝、情牵百姓、勇于探索、不畏邪恶。在《离骚》和《九章》中有大量的诗句能使我们感受到他对祖国的深切情感，他虽然遭受很多磨难，但是他对祖国的忠诚没有改变，对人民深切热爱的赤诚之心没有改变。“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在《离骚》所云：“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以此表达他为追求国家富强的初衷梦想，坚持高洁的品质不怕千难万险、纵死不悔的忠贞情怀。这些诗句，充分表达了屈原对祖国和人民的深爱之情。

中华春秋

家书中的交友观

□ 石志刚

古人在交友方面颇有心得。大千世界、纷繁复杂，如何在芸芸众生中选择至交之人引为人生知己，非常艰难。张习孔在《家训》中说：“吾人防患，首在择交。所交非人，未有不为其所累者。”对于古人来说，如果交友交得好，意气相投，相谈甚欢；如果交友交得不好，就会受友连累，毁及自身。

袁了凡在《训儿俗说》中说：“至于朋友之交，且宜慎择。苟得其人，可以研精性命，可以讲究文墨，可以排难解纷，须要虚己求之，委心待之，勿谓末俗风微，世鲜良友，取人以身，乃是格论。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至。”“日常相与，我先以厚施，彼必以厚报。”“又交友之道，以信为主，出言必吐肝胆，谋事必尽忠诚。”袁了凡在家训中对于真正的友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朋友在一起，可以切磋学问，可以排忧解难。东汉年间，作为战国赵国名将廉颇的后裔廉范少有志行，后去京师拜薛汉为师，名重于一时。此时，陇西太守邓融召廉范做功曹，对廉范有知遇之恩。邓融和廉范，于公，是上下级关系；于私，是亲近友朋关系。传统社会，亲近的上下级关系都有儒学传于近人的说法。廉范少不了要从邓融的身教中学习很多内容，邓融亦以亲信对之。

恰逢，邓融被牵涉到一个案子中，廉范知道这个案子非常复杂，于是以生病为由请求离开，打算用变通的方法来帮助邓融。邓融不知廉范本意，对廉范的离开，非常生气。廉范辗转来到洛阳，改名换姓，请求代理廷尉、狱卒的工作。不久之后，邓融因案子牵绊，被押赴洛阳监狱。在洛阳监狱工作的廉范正好能够服侍邓融。邓融对廉范说：你怎么长得像我以前的一个部下？廉范对邓融说：你是不是神经错乱了啊。廉范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且一直服侍在邓融身边，直到出狱，等到邓融去世的时候，廉范送葬到南阳。所有这一切所为，邓融都不知道。

廉范的授业恩师薛汉因涉朝争而被杀，“故人门生莫敢视”，廉范“独往收敛之”，官吏将此事上报朝廷，皇帝当时很生气。皇帝召见廉范：薛汉参与楚王叛乱，你为何不与朝廷同心，却反而为其收尸啊。廉范回答：“臣无状愚戇，以为汉（薛汉）等皆已伏诛，不胜师资之情，罪当万坐。”廉范感恩于薛汉曾经的师生情，是基于薛汉对自己知识的授予，所以有“彼必以厚报”的结果。皇帝由此对他大加赞赏。

张师载在《课子随笔钞》中引用何氏家训：“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必须趣向正当，切磋琢磨，有益于己者，始可日相亲与。若乃邪僻卑污，与夫柔佞不情，拍肩执袂，相诱为非者，慎勿与之交接。”

交友的初衷如果是为了禄位、升迁，作出“邪僻卑污”之事，终会被人发现，遭社会淘汰。南北朝在南朝宋、齐两代政治舞台上颇为活跃的一位政治人物叫江谧，他人生的志向是当位极人臣的大官，为实现这个目标，不惜在交友方面进行投机。当他还担任县令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南豫州刺史刘彧，“竭力侍奉”，进行投机，等到刘彧登基成为皇帝即历史上的宋明帝，对江谧委以重任，“以为骠骑参军”。江谧的交友“付出”，得到了相应回报。

“性流俗，善趋时利”的江谧在宋明帝的长子刘昱即位后，因刘昱日益昏暴，“朝野咸属意建平王景素”，江谧亦投资刘景素，“深自委结”。结果，刘景素起兵失败，江谧的投资亦告失败。但他性不改俗，继续他的投资事业。此时，他将眼光瞄向了萧道成，“独竭诚归事”。投桃报李，当了南齐皇帝的萧道成，对江谧委以重任，“以谧为长史”，后升迁他为“左户尚书”。然江谧终归德不配位，萧道成没有始终信任他，引起他的记恨。江谧由此鼓动豫章王通过叛乱当皇帝，结果被即位后的齐武帝发现，“诏赐死”。

交友过程中，如果能够秉持取其长处、摒其短处的态度，无疑是最为智慧的交友方式。孔齐在《至正直记》中说：“吾尝谓取友相观以善，有以全德而交之者，有以一行而交之者，又有一善则思齐，有一不善则当自反，非谓好其善而不知其恶也。”孔齐的观点与颜光敏在交友要取长补短这一点认识上是一致的。颜光敏在《颜氏家训》中说：“百里一贤，犹比肩也，益友盖难言之，顾朋友一伦，必不可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读书修业，必有相为砥砺、问难之人，有缓急则可恃，欲为不善则恐其知，斯友也。”唐代名臣王珪在唐太宗时期为臣的时候，非常注意与贞观名臣进行交友学习。“时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征与珪同知国政”，如果自命清高，互相看不起对方，一方面交友就会遇到障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朝政秩序的安稳构建。王珪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贞观这些名臣身上的优点，并且积极向这些人学习，评价语言中也不吝惜对他们的赞赏：“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于尧舜，臣不如魏征。”唐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谓之确论”。

张永明在《张庄僖家训》中说：“与刚直人交，心所畏惮，故言择，行必谨，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与善柔人交，意觉和易，然而言必予赞，过莫予警，积尤悔于身而不自知，损孰大焉！故味美多生疾疢，药石可以长年，信夫！”对于刚直直谏之人，要虚心接受他的谏言，这样做有利于科学决策和朝政治理。唐代名臣魏征在历史上很有名气，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敢于向皇帝进谏，赢得唐太宗的信赖，成为股肱之臣。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明君，在于他能够虚心纳谏，听取魏征为代表的谏臣之言。魏征能够当谏臣的潜质在于他“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唐太宗之所以敬重魏征，亦在于魏征能够不留情面地指出朝政的得失，作出有益于朝政的决策。唐太宗嫌弃上疏陈奏的事情过于繁琐，“欲加黜责”。魏征向唐太宗谏言：“古者立诽谤之木，欲闻己过，今之封事，谤木之流也。陛下思闻得失，只可恣其陈道，若所言衷，则有益于陛下；若不衷，无损于国家。”唐太宗非常认可魏征的建议。类似这样的进谏比较多且富有成效。唐太宗深刻地指出：“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

先秦思想奠定传统政德文化

□ 尹传政

政德，最早出自《论语》，曾这样描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意思就是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政德就是指古代官员的从政操守与品德。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传统政德是随着国家而产生，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文化形态，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以儒家为首的众多学说思想家纷纷提出了国家治理的思想，使传统政德文化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从根本上奠定了传统政德的思想文化基础。

“家天下”“家国一体”的思想成为传统政德文化的核心理念，贯穿于政德文化发展的始终。夏朝的建立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形态，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国家也由此诞生，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由天下大同、人人共享的思想被“家天下”的思想所替代。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分封制度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而以血缘关系为基本内容的宗法制度理应成为了维系“家天下”局面的纽带。因此，“家国一体”成为夏、商、周朝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为国就是为家，为家也是为国，家国不分。官员治理国家就是分内的事情，应该的担当和责任。所以，这种“家国一体”的理念常常体现在以后官员中对国家的那种担当精神，如“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尤其是在后来不同时期的家训中都把国家和社会责任作为对子女为官担当使命的教化，如《颜氏家训》在《涉务篇》中就教育后代要做好六个方面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办也。”

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成为了传统政德的价值追求。以民为本思想在先秦时期有众多论述，尤其是儒家对其进行了充分阐述。儒家提出了民众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依靠力量。《尚书·五子之歌》提出百姓为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就安宁，“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因此，在孟子看来，民心向背决定了一切，《孟子·离娄上》就强调，“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荀子更是形象地把民众的力量比喻为民水与君舟之间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因此，儒家明确提出要依靠民众，就必须要为民众服务，优待民众的思想。孔子就指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可见，只要百姓富足了，国家就不可能贫穷。反之，如果对百姓征收过甚，这种短期行为必将使民不聊生，国家经济也就随之衰退了。“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所以，从政者始终将“爱民”“顾民”作为衡量执政的标准。

先秦时期修身正己思想被政德文化视为古代从政者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们认为，为官必须具备两项基本能力才能够胜任官位：一是具有思想修养，二是做官的本领。如孔子在《论语·里仁》提出为政者要“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担忧自己有没有职位或职位高低，而是要担心自己有没有胜任这个职位的本领，做官要具备相应的品德与才能，否则就不能胜任其官位。

儒家思想首先强调做官之人就必须品行端正，“以修身为本”。这在儒家思想家看来，从政者必须加强自身修行，才能达到为官的效应，才能领导其他人，“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意思是当政者如果能端正自己的行为，对于为官从政之事来说还有什么困难？如果不能端正自己的行为，怎么去端正别人的行为呢？否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孔子认为要实现正己，就要通过不断地“克己”“修己”。对于克己修身的途径，孔子等思想家提出：依靠自己的修为，“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要有意识地加以选择，使自己迅速提高道德修养，如《论语·里仁》就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述而》就提出，“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因此，以后的从政者都把修身视为做官的根本，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便可知道。

先秦时期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也对为官之人提出了较高的能力要求。其中，内圣外王则成为评价从政者能力的标准。《庄子·天下》最早提出了“内圣外王”一语，“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同样《左传》中强调的立德、立功、立言亦表达了“内圣外王”的意思。孔子更是主张为政者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显然，在孔子看来，为政者要实行“仁”，即“爱人”才能达到施政的效果。同样孟子主张实行仁政，在《孟子·梁惠王下》中提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显然，为政者，要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儒家学者曾子在《大学》中开宗明义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显然，有着较高的思想境界，并实行亲民、爱民，是从政的基本要求。这些为官的要求成为以后历朝历代执政者追求的目标。

先秦时期的廉政思想为后来的从政者提供了洁身自好的标准。孔子认为，俭朴是人具有好品质的前提。“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意思是一个人如果奢侈了就显得不谦逊，太节俭朴素就显得寒酸。与其显得不谦逊，不如宁可显得寒酸。孔子认为廉洁俭朴最终对于从政者爱民具有重要意义。“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大意是君子要给百姓以恩惠而自己却无所耗费，使百姓劳作而不使他们怨恨，要追求仁德而不贪图财利，庄重而不傲慢，威严而不凶猛。同样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要想治理天下不能强加改变自然规律，而真正的智者在顺其自然的同时去掉奢靡，以实现治理目的。“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可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去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而道家另一名思想家庄子也强调廉洁对于个人名节的重要性。“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由此可见，廉洁对于从政者而言，事关自身的品行和名节。以后的从政者都以廉洁为自己道德品质的体现。

有所思